

罪行与妥协

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

〔英〕威廉·肖克罗斯著

325

新华出版社

罪行与妥协

——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

〔英〕威廉·肖克罗斯著

吴仁译

李宗凯校

新华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师颀

罪行与妥协

[英] 威廉·肖克罗斯著

吴 仁 译

李 宗 凯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80,000字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14 定价：0.86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以卡达尔个人经历为背景，以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前后的国内政策为主线，说明匈牙利的现状，以及匈人民对卡达尔看法的转变。书中详述了卡达尔上台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在一九六八年实行新经济体制后，匈牙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社会情况的变化，还叙述了匈苏两党关系、卡达尔和赫鲁晓夫私人关系等。

全书共十三章。它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卡达尔上台执政后，匈牙利各方面的变革，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和现今仍存在的问题，有参考价值。

第一章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天色阴暗，布达佩斯的科苏特·拉约什广场空荡荡的，那里只有几个噙着眼泪的老太婆在胸前划着十字，在国会大厦那座仿哥特式建筑物墙下的人行道上插起蜡烛，祈求上帝保佑。整整一天，有关俄国军队在这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说法不一的报告，通过电话传进这座十九世纪的宫殿。这座建筑物座落在寒冷、灰暗、肮脏的多瑙河岸上。总理纳吉·伊姆雷（后来被处死）这时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面坐着的是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此人后来成为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头子。

七天前，即十月二十四日，俄国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企图镇压示威者。那些示威者要求对匈牙利政府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实行的制度进行彻底检查。一九四八年，匈牙利共产党人在受过莫斯科训练的领袖拉科西·马加什的领导下，夺取了全部政权，为的是遵照斯大林的榜样和命令使匈牙利苏维埃化。八年来，千千万万的人丧失了生命，或至少失去了生计。这种恐怖的一个特点是既迫害非共产党人士，也迫害共产党员：党的许多最重要的干部被捕，其中一些

人，包括战争时期的党领袖拉伊克·拉斯洛也被处死了。

象波兰发生的造反一样，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的起义是由于赫鲁晓夫当年二月谴责斯大林而引起的。这个出生在乌克兰的矮小的俄国人，要求摒弃斯大林及其崇拜者用以统治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僵硬刻板的方法。在匈牙利，人们把这当作是授予他们全权来清除一切与过去八年相联系的人和 방법。

人民最初的要求的特点与其说是反共，不如说是反对斯大林。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是一位举止文雅、留大胡子、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他看上去象个心地慈善的歇了业的杂货店老板。他的名字叫做纳吉·伊姆雷。

一九五六年七月，拉科西终于下台了。然而他的职务并没有交给改革派分子纳吉，却交给了他的同事斯大林分子格罗·埃诺。所有的匈牙利人都把格罗与八年来的恐怖行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象拉科西本人一样不得人心。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学生们举行示威，他们主要的要求是：解除格罗的职务，由纳吉来接替他。示威者同秘密警察发生了冲突，俄国立即命令红军动员起来。

但是，变革的要求是得到匈牙利各阶级和各种年龄的人的拥护的。尽管苏联坦克到处巡逻，进行威胁，纳吉还是取代格罗当上了总理。他开始计划进行人民所要求的某些改革。

俄国人似乎犹豫起来了。在俄国军队驻扎到布达佩斯市郊和匈牙利所有大城市周围的同时，赫鲁晓夫的使者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正在同这位新任总理讨

论这场危机。十月三十日，他们向纳吉保证，他们一定要撤回军队，相信匈牙利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在许多匈牙利人看来，苏联军队在拔营、捆扎帐篷和将他们的卡车、装甲车及坦克开回东方的过程中拖延的时间是太长了。

十一月一日凌晨，安德罗波夫大使来了，他要心中惴惴不安的纳吉放心：不管表面上看来情况怎样，撤军工作仍在“正常”地进行着。纳吉问安德罗波夫：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匈牙利北部和东部边境一带的村庄送来报告说，有七万五千名左右的苏联军队和两千五百辆坦克正开进匈牙利，这是怎么回事？安德罗波夫怎么能够解释惊慌失措的地方官员和农民打来的电话内容呢？他们说，红军士兵宣称自己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来镇压法西斯反革命分子的。安德罗波夫解释不了这些电话内容。这位大使离开之后，午饭时分，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为了满足群众提出的取消共产党执委会的要求而刚刚改组过）召开会议，讨论应该如何对待苏联同志。出席会议的有：纳吉·伊姆雷本人，他是人民在过去八年中信得过的少数几个共产党员之一；正直的党干部明尼赫·费伦茨，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献身于党的事业，一向是顺从上级，很少表现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身材瘦高的卡达尔·亚诺什，他现年四十四岁，可是看上去要苍老得多，在国内不很出名，了解他的人都承认他是斯大林式审讯的受害者，因此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受到信赖，他虽然是个没有经受过考验的新的党领导人，可是颇得人心；头发斑白、面孔瘦削、身体瘦弱的卢卡奇·捷尔吉，他无疑是一个

世纪以来匈牙利最重要的哲学家。他讲起话来常常用省略音，并以谦虚而温和的语气，劝告别人办事要稳重。

这些人及他们的同事一致认为，纳吉应该向苏联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除非红军确实离开，除非匈牙利人真的看到红军马上离开，否则匈牙利就立刻宣布中立和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就意味着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将匈牙利人紧紧地同莫斯科连结在一起的兄弟般联系将会断绝。对于这些终生当共产党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大胆而重要的决定，他们作这样的决定就象天主教神父否定教皇的权威一样困难。当时，只有卢卡奇·捷尔吉和另外一个成员（此人并非卡达尔·亚诺什）反对这样做。

当天下午，边境村庄、国内许多机场的地勤人员、铁路官员和匈牙利自己的军官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红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正在得到增援，进入更有利的阵地，挖掘工事，准备在这个国家作战。

纳吉和他的同事们真的做到了他们原先扬言要做的事情。那天下午五点一刻，在暮色之中，一辆苏制黑色小轿车的灯光照亮了国会大厦的广场。尤里·安德罗波夫再次步入这座宫殿，倾听匈牙利领导人要对他讲的话。

首先，纳吉把他的政府的决定通知了这位大使。然后，他的主要阁员们口头表示支持。在他们作口头表示的时候，四周几乎鸦雀无声。但是，轮到卡达尔·亚诺什讲话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尤里·安德罗波夫面前，几乎抑制不住愤怒，大声喊道：“我是匈牙利人，一旦需要，我会赤手空拳

地对付你们的坦克。”这使在场的同事们吃惊和担心。尤里·安德罗波夫一言未发，离开了总理办公室。他走到门外，由他的助手陪同，一起走下楼梯。他穿起大衣，坐上公家的小汽车，回到苏联大使馆。

几个小时之后，纳吉向人民广播了中立宣言。当晚九点五十分，卡达尔·亚诺什在“自由科苏特电台”宣布：“我国人民举行光荣的起义，摆脱了拉科西政权。”

第二个星期，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那天卡达尔对安德罗波夫发火是如实地反映了他的匈牙利同胞的情绪。当苏联坦克于十一月四日早晨终于开进布达佩斯镇压革命的时候，确有千千万万的市民走上街头，赤手空拳地，或者用他们所能拿到的任何武器进行斗争。那天清晨五点零八分，纳吉通过电台宣布布达佩斯受到进攻。他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现在在讲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显然企图推翻合法的匈牙利民主政府。我国军队正在战斗，政府在坚守岗位。我提请我国和全世界的人民注意这一事实。”

几乎恰好在纳吉发表广播演说的同时，从布达佩斯东面某地苏联控制的电台发射的电波里，传来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是卡达尔·亚诺什的声音。对于他来说，“光荣的起义”一转眼就变成了刚发生的反革命事件。他宣布说，一个新的自封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根据我国、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的利益，请求苏军统帅部协助我国人民粉碎黑暗的反动势力，在全国恢复秩序和安宁。”事情确实这样血淋

淋地发生了。

十一月七日，卡达尔乘苏联装甲车回到布达佩斯。这时，红军已经消灭了大多数革命者。他的任务是使短命的纳吉政府正在酝酿的改革流产，还要把匈牙利拉回到苏联正统思想的狭窄轨道上来。象卡达尔·亚诺什当时那样在一九五六年秋天的那些欣喜与痛苦的日子之后受到老百姓如此痛恨的匈牙利领导人，在本世纪是寥寥无几的。

然而今天，这一点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卡达尔·亚诺什现在是华沙条约国中最得人心的领导人。他从自己所造成的革命的废墟上，终于建设起世界上最通情达理、最明智和最讲求效率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匈牙利人现在说他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快乐的兵营”。这并非只是挖苦。他们赞扬卡达尔造成了这种局面。他原先受到人们几乎普遍一致的厌恶，被看作不仅是背叛本国人民，而且也是背叛自己最好的朋友拉伊克·拉斯洛的人，而现在他不仅受到他那位朋友的朋友们，而且也受到本国人民的极大尊敬，这并非平凡的事迹。

只要研究一下匈牙利今天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就可以最清楚地看出卡达尔政治品格的发展和匈牙利人民对他的感情变化的原因。即使说卡达尔就是今天的匈牙利这一提法不正确，那么说卡达尔体现出今天的匈牙利，这肯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许多匈牙利人确信，这个国家没有他就会大不一样，生活大概就会糟糕得多。

为了说明匈牙利事实上已起了多大的变化，我观察了匈

匈牙利社会的不少特点，其中包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及它所意味着的党的作用的改变，一九六八年实行的经济改革的影响、文化的地位、出版自由和青年对本国实行“卡达尔化”所抱的态度。

关于现代匈牙利的这个形象，我要努力通过描绘卡达尔·亚诺什本人的形象来表现。原因很简单：他的经历说起来是十分精彩的故事。一九五八年，他成为罗伯特·阿德里写的一个剧本中的主人公。这个角色由伦敦“皮卡迪利剧院”的彼得·霍尔扮演。这个剧名叫《英雄们的影子》，是一出好戏。今天仍然可以说，它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战后由于敬爱而陌生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把个人意志强加给中欧共产党人而给他们造成了痛苦、沮丧、渴望、幻灭和背叛。

《英雄们的影子》试图刻画五十年代的东欧共产党人，其手法与《正午的黑暗》描写三十年代苏联党员的思想过程如出一辙。这个剧在这方面刻画得维妙维肖，这不仅因为剧本写得巧妙，还因为阿德里选择了卡达尔这样一个题材。大概可以看出，卡达尔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不幸、绝望、困境、仇恨和苦难，可能比东欧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领袖所遇到的都多。

然而在今天的匈牙利，卡达尔过去生活的细节是很难探知的。匈牙利人都热切地想表示对他的钦佩，可每当有人询问起来的时候，他们又都承认自己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结过婚吗？“我想是结过。”他住在哪里？“我不清楚。”他的生日是哪天？“不知道。”他有子女吗？“我想

是没有，但也许有。”他有什么嗜好吗？“我想他喜欢散步和看书。无论怎样，我是这么想的。”匈牙利人这么无知，其部分原因是卡达尔憎恶宣扬个人。他的正式传略（从未超过几百字的篇幅）总是说，他的父母是“穷苦雇农”，农民，或“农业工人”。在四十年代末，他的传略说他出生在巴拉顿湖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从那以后，说法上又有微妙变化：现在只简单地说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以省略的方式暗示，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经过省略，这些传略并未透露他的成长道路有什么不平凡，也没透露他的父母的关系有什么不正常和不幸福的地方。现在人们才第一次知道，卡达尔在童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很不一般，这大大有助于说明他性格中的一些令人难于理解之处。

至于他后来的生活，党只愿正式说：他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党；同纳粹作过英勇斗争；“在拉科西·马加什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时期，由于被诬陷”于一九五一年入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他协助挫败了反革命，并且领导了重新建党的工作”。

关于卡达尔·亚诺什的情况，党要告诉人们的只有这一些。在我首次访问匈牙利期间，有人告诉我，如果我还想再去的话，千万不要写关于卡达尔的著作。其结果是，在写关于卡达尔的著作上，我完全没有得到党和政府官员们的合作。有人很客气地对我说，党史研究所的档案中没有卡达尔的履历材料，他在党和政府里的同僚现在都声称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他本人每年只向一个经过挑选的西方记者发表一

次谈话。我没被他选中。他向他接见的那些记者从不多讲自己。

卡达尔的前任拉科西把斯大林式的个人迷信，搞得过分了，所称颂的是领袖而不是党。他由于厌恶这种做法，所以有意将自己打扮成无名的干部或官员。他身穿灰衣服，不引人注目，引导着他的党和国家通过共产主义改革的凶吉未卜的阴影，自己却站在背光的地方把脸转过去，不让人看见。由于意识到他过去可能遭遇到现在也许还感到惭愧而且无论如何不愿再提起的事情，许多匈牙利人尊重他在保密方面所抱的个人动机和政治动机，甚至有些因处于某种地位而对他有所了解的普通公民，现在也不愿意谈论他。但是，先根据在党内模模糊糊地了解到的情况来考虑一下，然后再沿着布达佩斯的小巷、巴拉顿湖周围的湖滨、村庄以及南斯拉夫的沿海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卡达尔的曲折、悲惨的生活经历及其个性，几乎确切地反映了匈牙利共产党同它五十年来一直企图控制和代表的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二章

我要快乐，但不愿象仓鼠一样孤单。

卡达尔谈他年轻时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在一九一〇年中欧闷热又干燥的夏季，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斯洛伐克农家姑娘离开自己的家，出发往南走，或许是为了寻找出路，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为了追求较好的生活。因为她的家是在又脏又乱的欧焦洛这个小村庄里，位于多瑙河畔的小镇科马尔诺以北大约四十英里的地方，在铁路线旁边。那条铁路从布达佩斯通向斯洛伐克，通向当时庞大而又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的更远的地域，奥匈帝国的领土延伸得很长，对中欧的控制力量很弱。欧焦洛是个贫困的农业村庄，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而没有什么闻名之处。

第一，它是阿尔帕德·费斯蒂的诞生地。他画的匈牙利的发现者、缔造者马扎尔族首领阿尔帕德的巨幅圆形画像一直挂在布达佩斯一个帐篷里的四周墙壁上，直至这个帐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为止。其次，意义稍为大一些的

是，欧焦洛有一个天文台。这个天文台于一八七一年建在富有的地主、天才的业余天文学家米克洛什·孔科伊·泰盖的庄园里。天文台是周围数英里地区内观测星星的唯一地方。本世纪初，一位海德尔堡天文学家以欧焦洛天文台的名字来命名一颗小行星。但是，当时刚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把这个村庄的名字改为斯塔尔多拉村。在一九一九年特里亚农和约签定的时候，战胜的同盟国兴致勃勃地分割了奥匈帝国所剩下的领土，这个新国家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毛绍里克·托马什为捷克人获得了现在的斯洛伐克这块地方^①。

但是在奥匈帝国被肢解的整整七年前，在欧洲毫无意义地陷入上一次传统战争的几乎两年之前，采尔毛尼克·博巴拉从欧焦洛出发，沿着干旱的小路往南走，有时步行，有时乘马车，走上了通向科马尔诺的大道，沿着多瑙河的两岸往前走。多瑙河从维也纳起，时而往东时而往南，蜿蜒流去。她一直走到布达佩斯（在这里她曾想逗留下来，但她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她又往南走去。她穿过巴拉顿湖（匈牙利的内湖，水浅而多雾，但在匈牙利人看来，要比任何海洋都更加美丽）南岸被微风拂动的绿色烟草田，走过外多瑙地区一些小山顶上的葡萄园，在那些愿意接待她的、挨饿的无地农民的破旧房舍中过夜，她趟过水流湍急的德拉瓦河（这条河现在沿着匈牙利、南斯拉夫边境的一部分地方流过去），

① 欧焦洛已经又改了名，它现在称为胡尔巴诺沃。

直至最后走到了伊利里奥沿岸，但这仍在奥匈帝国的疆界之内。在热闹的阜姆港（现在称为里耶卡），她找到了工作，当了城里一位职员的女佣人。这位职员住在该市一个比较繁荣的市区的一座大房子里。

当时驻在阜姆的是奥匈帝国步兵第四十四团。有一个名叫克赖辛盖尔·亚诺什的匈牙利年轻农民在这个团里当勤务兵，履行国民义务。他出生于巴拉顿湖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普斯陶塞迈奈什，博巴拉曾穿过这个村子往南走。一九一一年的一天，亚诺什和博巴拉在阜姆的一家咖啡馆遇见了。亚诺什爱上了这个来自斯洛伐克的、朴素、身段丰满而又颇为可爱的直率姑娘。在那里，奥西诺和美奥拉发现他们似乎早就十分热烈地相爱了，他们俩在一起睡觉。

博巴拉怀孕了。亚诺什十分不安地说，举行婚礼是根本不可能的。谢天谢地，他在这个城市服役无论如何快要期满了。他背着挎包，迅速地迈开沉重步伐，独自一人徒步走向普斯陶塞迈奈什村的家中。

博巴拉的男孩是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阜姆的普通医院里出生的。在里耶卡，今天仍然保存的出生登记簿上写着，她给他起的教名叫约瑟夫·亚诺什。他的姓叫采尔毛尼克，而且还为填写他父亲的姓留下一个空白处。

在亚诺什出生之后，博巴拉由于这种不端的行为而被这位城市职员解雇了。她在阜姆越来越难于找到工作。一九一四年由于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爵在这个地区相距几百英里的地方遇刺了，她决定现在是她和她的小婴孩去寻找她的爱